

◆ 李 陀/主编 大众文化研究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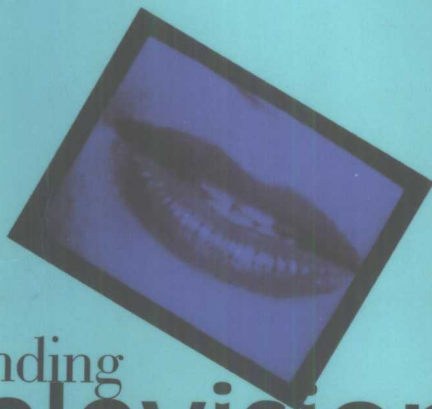
中 央 编 译 出 版 社

电视的真相

[英]安德鲁·古德温、加里·惠内尔 / 编著

Edited By Andrew Goodwin And Garry Whannel

魏礼庆 王丽丽 / 译



Understanding
Television



大众文化研究译丛 ◆ 李 陀/主编

电视的真相

英 安德鲁·古德温、加里·惠内尔 编著
魏礼庆 王丽丽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京权图字:01-99-0311

Understanding Television

Copyright© 1990 Andrew Goodwin and Garry Whannel

本书中文版由 ROUTLEDGE 出版公司授予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不得复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电视的真相:电视文化批评入门/(英)古德温(Goodwin, A.),

(英)惠内尔(Whannel, G.)编著;魏礼庆,王丽丽译.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2

(大众文化研究译丛/李陀主编).

ISBN 7-80109-396-8

I. 电… II. ①古…②惠…③魏…④王…

III. 电视-文化-研究 IV. J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9761 号



中央编译出版社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编辑部:66117130 66521152 发行部:66171396

E-mail:ectp_edit@sina.com

北京京鲁排印部

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81 千字

7.875 印张

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16.00 元

序

李 陀

阿尔图塞对 20 世纪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了主体建构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的内在关系。在论述这个关系的过程中,他详尽地分析了国家、教会、学校、家庭和司法等机构在人的“自我意识”形成中所起的重要的“召唤”作用。他这一理论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现代国家和社会如何自我正当化的认识。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这两个概念的相对自足性,在阿尔图塞的质疑下都成了问题。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当中,特别是二战以后,由于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出现了种种阿尔图塞所不能预料的新的因素:商品和物的体系包围了人,并发挥着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功能。重要的是,与阿尔图塞所分析的国家、学校等机制的活动方式不同,当代意识形态的有效过程主要是通过日常消费的行为完成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正是以此变化为背景,一批被称为“伯明翰学派”的英国批评家开始了对当代文化批评的开拓,继而影响世界,使文化研究迅速普及于许多国家,并在 80 年代之后成为当前世界上最活跃的理论领域。

在阿尔图塞之后,英国的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等一批理论家,不仅对以往有关意识形态的经典论述进行了批判和分析,而且借此对大众媒体与国家、个人的关系,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等问题,都作了新的讨论和阐释,或者提出了新的理论。这些理论活动深刻影响了文化研究的发展。在一个新的批评视野里,以精英文化为主体的诸种文化现象不再作为分析和研究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主要对象,恰恰相反,这种分析和研究把注意力转向了被以往的理论活动所排斥或推向边缘的领域。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诸如广告、时装、电视剧、畅销书、流行歌曲、儿童漫画、新闻广播、室内装修乃至休闲方式都成为理论分析和批评的主要对象。因此,文化研究不是我们通常字面上所理解的那种对“文化”的讨论,也不是在各种传媒学科的名目下发展起来的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理论,而是特指近几十年以来,在英国的“伯明翰学派”推动下成熟起来的一种跨学科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涉及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而且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和新的结构性压迫的形成,涉及到它们和文化、经济生产之间的复杂关联。可以说,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人们对自己生活其中的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的一个最具批判性的认识活动。

近十几年中国最大的变革无疑是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在这一发展中,中国当代社会的变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多个层面,各个层面的变革又相互缠绕和渗透,形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更可注意的是,有很多迹象表明,虽然还远不够富裕和发达,但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大众消费时代,特别是大都市和沿海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物的体系”对人的包围已经形成,商品消费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形式,同时,大众文化如洪水

般蔓延全国,广告、时装、流行歌曲不仅深入人的日常生活,而且成为亿万人形成自己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这一切都不能不构成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面对这样一个历史情势,考虑到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正是大众文化以及与其相连的日常生活,考虑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我们的文化生活因此也必然会与跨国的文化生产及其机制相互交叉,那么在中国开展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应该是很明显的。文化研究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使我们不能不考虑,从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入手研究中国的社会变革是否可能?分析文化和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否是认识这个变革的一种有效途径?伯明翰学派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化研究是否可以借鉴,成为我们认识中国现实的某种思想和理论资源?

除以上考虑外,文化研究还有其他使中国知识人重视的理由。

其一是它对20世纪知识分工过于细密的反动。或许有人认为今天知识分工或分类这样细致是知识自身发展的逻辑,这种看法就事论事,恐怕忽略了近代知识生产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今天批评、警惕西方知识霸权已经在中国知识界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可,但是人们对当代建立在“学科”基础上的知识分类很少有批评,把这个分类系统当作无可置疑的给定的东西接受下来,很少把这系统同样看做是西方知识霸权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其实,一方面是知识分工越来越细,学科越设越多,各学科各领域之间鸿沟愈深,知识人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彼此被“行话”“行规”阻隔,谁也不知道谁在想什么、干什么;另一方面,对这种僵死的知识分工的批评在本世纪也从未中断过,许多批评者都指出,追根究底,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和需求,迫使知识生产

和服从发展技术、发展经济的需要,并按照这种需要建立学科分工,划分知识领域,造成分类越来越细的现象。更严重的是,由于科学主义正是在这过程中建立了它的权威地位,人文知识领域亦不得受其统摄,于是本来和自然科学知识是两股道上跑车的人文知识,也按照“科学知识”的分类模式进行了细密的分科和分工,由此形成 20 世纪知识发展的基本格局。不用说,这个格局对知识发展产生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但其阻碍知识发展的负面的作用也越来越被人所重视。马克思主义和 60 年代崛起的结构主义思潮,就都曾在抵抗繁琐的知识分工,强调从各知识对象的联系中对人和进行跨学科研究和认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近些年来,这种抵抗又由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等理论思潮的活跃而得到大大的加强。可以说,这是 20 世纪下半叶知识图景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很可能将对下一个百年的人文知识发展起重大影响。是不是未来的知识,起码是人文知识会有完全不同的面貌?是不是隔行如隔山的学科分离会更进一步被打破?是不是跨学科研究会成为常规方法?这些当然都不好预测,但无论如何,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在各国兴旺起来,与人们试图寻找新的立场、方法和知识态度这种愿望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正是文化研究把这种愿望表达得最为强烈。

总之,无论从满足在中国开展文化研究的现实需要来说,还是从文化研究所暗示的未来知识发展的新的可能性来说,在中国较为系统地翻译、介绍国外文化研究的发展、现状及其代表性论著,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套“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文化研究以关注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为其显著特征,但由于它非常重视理论方法,在它不很长的历史发

展中,它不但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等多种理论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而且还有一种互相影响、互相纠缠、共同发展的历史,所以理论性非常之强,远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简单明快。这给本套丛书的编选、翻译带来两大困难。一是翻译难,很多概念、提法和修辞都很难在汉语中得到相应的表达,除了经验和水平因素,译者们往往要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硬译”,这自然难免会影响译文的质量。编者和译者在今后会不断努力改进,但恐怕很难在短时间里有理想的进步。再一个困难是遴选书目的标准。有关文化研究的理论著述太多了,到底何取何舍?我考虑很久,决定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也就是先选一些分析、论述都比较具体,大半都涉及读者较为熟悉并有兴趣的电视媒体、时装、肥皂剧等文化形式的作品,然后再进一步介绍那些理论性更强的论著。这样做有个缺点,就是本来对了解文化研究更为重要的一些著作只能晚一些再着手译介了。不过,世界上许多事本来就难以两全,急也无用。

最后还要罗嗦几句的是,这套译丛中所介绍的著作当然都不是什么金科玉律,甚至其观点、方法会有很多不当或错误之处,因此它们只能是我们做文化研究时的某种参考和资源,不必迷信,更不能照搬。这在对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批评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的今天,应该不再是很大的问题。和国外理论建立一种批评关系,并在这种批评中发展自己的理论,理应是理论界的共同目标。

序 言

安德鲁·古德温 加里·惠内尔

在我们这个社会,对电视的研究似乎是在甚为可笑的两个极端进行的。日常生活中——在通俗刊物上、公共汽车和火车上、在我们的厨房和起居室里、在无线电广播里以及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交谈中,人们不断地对电视进行“研究”。这种对电视的研究通常是零散的,有时还故弄玄虚,并且几乎都不具理论性。在另一个极端,过去 20 年里产生了一大批适用于电视的学术理论和观念。如今,有数十种专著和学刊发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语言学、心理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等对电视作出的分析。在这有着巨大差异的两类研究之间,还有报纸和杂志上的电视批评,这是惟一定期发行的电视分析。但是,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堆砌辞藻的闲言碎语,至于那些花边小报的东西,就更只是市井流言了。只要电视批评仍旧主要是那些不必掌握 20 世纪的文化理论就可以尽情抒发个人观点的作者们的论坛,它就无助于我们对电视的认识。

同时,教师和学生从这些分析(从“你听见昨晚希莉亚对里克讲了些什么”到“《小溪边》是属于现实主义的文本吗?”)中寻找头绪,试图应付这一现实,即市面上有关电视的出版物中,没

有多少浅显易懂、可供对于理论世界和大众文化分析还十分陌生的学生阅读的材料。本书就是为这些教师和学生编写的。各位作者都曾在成人教育和本科教育中教授电视的入门课程,本书就是他们多年经验的结晶。许多作者曾为伦敦大学的“电视研究证书”(Certificate in Television Studies)专业授课。我们这些曾在(而且继续在)这些班上授课的人,对于竟然没有一本教科书可用于向初学者介绍电视的历史、社会背景以及文本分析,都深有感触。

本书搜集了涵盖当代英国电视中主要问题的一些简短、易懂的文章,以填补这个空白。本书的各位作者在文中大量使用了过去20年中获取的理论性和经验性成果。

对电视的研究起源于许多不同学科(参见Cook and Hillier 1976)。早在1940年代,社会学家们就开始思索新型媒体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在美国,因为这里不像欧洲,对新型媒体的分析没有受到认为其他老的文化形式在美学价值上更加优越的观点的影响。在此后对电视的继续研究中,社会学家将重点放在对电视观众的分析上,进行“社会效果”研究和“收视及满意度”(uses and gratifications)学派的研究,后来还对这些研究途径加以优化,甚至与其他以文本为基础的各类研究思想相结合。

其他早期对电视研究的贡献是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50年代出现了一批形形色色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通常被戴上“文学悲观主义”的帽子,因为这些研究大部分都作出了负面的阐释,倾向于将大众文化(包括电视)视为一个问题。在美国,这一学派使认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以德怀特·麦克唐纳和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者结为同盟。(它的影响在尼尔·波斯特曼和杰里·曼德等当代电视批评家的作品中还可以见到。)在英国,谈到文化悲观主义,必然会涉及到文学批评

家利维斯及其追随者的论著。它们极力追求“辨析力”(discrimination)——亦即吹糠见米的能力,在“正确的”美学和道德标准的指导下作出文化判断的能力。

在1970年代的英国,对电视的研究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也正是这种转变构成了本书思想结构的基础。在吸收了大量的文化理论(多数自欧洲大陆引进)之后,英国的电视研究(同电影研究一样),开始认同包容了在电视批评中讨论过的个人品味等问题的概念,以及超越了“辨析力”培养的概念。对电视机构的社会背景的研究在早期一些有关这个媒体的社会学(Burns 1977)、历史学(Williams 1974; Briggs 1979)和政治经济学(Murdock and Golding 1977; Garnham 1978)著作中得到了更完整的发展。这种分析是在关于意识形态、经济权力和社会合法性等新的、更广泛的问题的框架下进行的。对电视观众的研究从对“社会效果”的过分注重中扭转过来,更加关注观众如何从电视“文本”中获得意义这个从总体上看更加复杂的问题(Fiske and Hartley 1979; Hall 1980)。诸如“文本”以及“语码”(code)、“叙事方式”(mode of address)等词汇的使用来自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符号学。即使符号学没有提供关于意义(meaning)的完整科学,从而奇迹般地“解决”阐释(interpretation)的问题,但至少可以肯定,它确实带来了一套比文学批评和社会学所使用的更加精制、适用的文化分析工具。

媒体理论和文化分析的这些发展带来了电影、流行音乐、青年亚文化、时装、广告和体育运动的新阐释,也改变了对电视的研究。许多电视研究中的新概念都来自或者部分归因于关于电影研究的理论著作。因此,通过举办会议、出版刊物以及参与教学,英国电影协会(British Film Institute)在电视研究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并不令人感到诧异。电影和电视相互

促进的另一个中心是电影电视教育协会(Society for Education in Film and Television, SEFT),其会刊《银屏》(Screen)和《银屏教育》(Screen Education)发表了很多构成“新”电视分析的重要文章。

许多高等教育机构也对这个新的领域作出了贡献。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理查德·霍格特任主任,后为斯图尔特·霍尔)在向英国观众介绍来自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理论方法方面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其会刊《文化研究草稿》(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发表了一些对电视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作品,包括翁贝托·埃科开始用符号学的方法研究电视的开创性尝试,如“走向对电视信息的符号学探寻”。其他机构(如中伦敦工业大学传播学院和莱斯特大学大众传媒研究中心)则从这些新的批评角度教授电视。

从此,对电视和媒体的研究主要在高等教育中发展,并且大多只限于研究生层次。在这种崇高的学术气氛下所提出的分析是否通俗易懂则是第二位的了。将这些材料变得易于理解的艰巨任务就常常落在了压力重重的教师们身上,他们潜心钻研《银屏》杂志上的最新理论,或者到英国电影协会的周末学校进修,然后再将这些理论转成尚未入门的人可以理解的语言。

媒体理论难以理解,既是由于其术语常常令人迷惑不解,也是由于这种理论确实而且也有必要复杂。不与意识形态的理论相联系,并经过极为复杂的辩论,其涵义是无法理解的。不借助于新的、精深的方法也无法破解其文本。新的专业术语不断进入到电视研究者的词典:体裁(genre)、叙事方式、隐喻、转喻、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意识形态、霸权、语码、常规、一词多义,等等(本书的一个任务就是向对这个领域还很陌生的学生解释这些术语)。

毫无疑问,要将这么多的著作变得通俗易懂并非易事。对于我们之中那些从事成人教育的人来说,这一直是一个特别的问题。如果说学者们对于大多数电视批评家关注自己的写作生涯多于电视本身的抱怨不无道理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学术界再多尽一点力就能更好地宣传自己。在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理论家在报纸和通俗杂志上发表电视批评和文化批评文章不是什么稀奇事。而在英国,理论性和通俗性之间的差异尤其巨大。除了偶尔向《听众》、《新社会主义者》、《今日马克思主义》和《新政治家与社会》等投稿之外,多数的电视研究分析文章都一直在相对不知名的专业刊物上发表。

尽管已有英国电影协会和其他机构(如 Comedia 出版社,参见 Root 1986)在提供通俗教材和新的教学资料方面所作的努力,本书仍旧是第一本介绍有关电视机构、文本和观众全貌的电视入门教材(参见 Masterman 1985; Clarke 1987; Alvarado, Gutch and Wollen 1987)。

1970 年代的一些进展没能及时“兑现”,也许可以用其发展参差不齐来加以解释:从较为一般的对电视进行的社会学研究,到在心理分析理论外围概念领域的长篇大论,这些理论进展多数没有得到巩固。也许在理论爆炸的 1970 年代,一个必然的副作用就是媒体分析对新观念趋于“朝三暮四”,使之看起来不像是学术,倒像是电视本身。研究者刚发现一些新思潮,比如说刘易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分析在电视上的涵义,几天后学术界却已经走向“后结构主义”了。新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理论经常在几个月之内就经历被发现、发展、批判和抛弃的过程。(对这个现象的一种解释是,英国由于理论贫乏,经常很晚才赶上国外的发展,现在才发现自己早已落伍。)

我们对 1970 年代的这一趋势稍微夸张了一点,主要是为了

严肃地指出:这种对新理论的重视造成了对许多富有潜力的观念和范例的提前舍弃。大家只要想想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最初被重新发现,然后被滑稽模仿和批判(当作滑稽模仿的东西来批判),到最后被抛弃的经历就够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丢失了许多重要的见解,而且任何旧事重提的企图在媒体理论走马灯似的 1970 年代都会马上被斥为完全过时。

对 1970 年代电视和媒体的大量分析仍需全面梳理,不仅包括那些可以重新评估的有用范例,而且还包括那些先天不足的理论项目,它们仍旧被遗弃在分析的路边,像仓促丢弃的旧车一样。其失败的原因还有待全面探究。关于“现实主义”的辩论就是这样一个被遗弃的锈水桶。1970 年代的理论空气生机勃勃,来自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心理分析学以及电影和文学理论的概念充斥其中,《银屏》和《框架》等学术刊物发表了众多用这些观念分析电视的文章。最终,这项工程在其自身理论性的重负下崩溃了,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论辩中止了,而让位于一场新的(而且显然毫不相关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仿佛 1970 年代早期的那些立场都不曾存在过。

1970 年代,这些工作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迷恋以牺牲经验分析为代价的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崇尚“独创性”的趋势(很明显这是为学术界的政治所决定的)。一个独创的理论经常比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更令人兴奋,也更有名望。在评价 1970 年代产生的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时,大家普遍认为问题之一就是仅仅将理论用于文本,而缺乏切实的分析,因此产生多种(有时是相互矛盾的)“理解”(readings)。

到了 1980 年代,产生了向经验主义回归的趋势:回归到通过研究电视产地来检测各种批评论辩(Feuer, Kerr and Vahimagi 1984; Ellis 1982);回归到通过更细致地阅读文本来

检测各种批评理论(参见 Newcomb 1987; Masterman 1985); 以及回归到通过研究实际观众来检测对文本的各种理解(readings)(参见 Hobson 1982; Ang 1985; Lewis 1985; and Morley 1986)。同时,也产生了与此相关的对流行(*the popular*)的兴趣,并研究流行。也就是说,1970年代的理论经常将流行的电视同某种事先给出的理论和政治标准相比照,看是否够得上;而1980年代则出现了朝按其本身的标准来看待流行的东西以及(为更好地认识它,)从实在的大众品味的文化而不是抽象的理论着手的转变(Bennett et al. 1981; Dyer 1981 and 1985)。在这短时期中经历了从对“严肃”(serious)电视(戏剧、纪录片、新闻、时事等)的关注到对流行的娱乐方式(肥皂剧、情景喜剧、流行音乐录像带、体育、游戏节目等)的转变。这种做法有其优势(而且的确可以从某种理论——一种建立在安东尼奥·葛兰西作品基础上的范例——推导出来),但也有人对它加以贬损(参见 Gardner and Shepherd 1984; Williamson 1986)。

1980年代的做法中还有一种更进一步的、更艰深的转变,它来自于对电视自身变化的领悟。这就是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辩。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这个词很难解释清楚,但是在这里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思想,它认为从许多方面来说,当代电视都无法用从文学理论和电影理论推导出来的旧的分析方式来分析。批评家们指出,像《迈阿密的罪恶》(Miami Vice)、《戴维·莱特曼主持的深夜节目》(Late Night with David Letterman)、《歌唱的侦探》(The Singing Detective)和《最大头顶空间》(Max Headroom),以及音乐录像带和音乐电视等新的电视形式和服务,在质的方面都不同于1970年代的电视文本(参见 Gitlin 1987; Grossberg 1987)。尽管这些批评家之间不无分歧,他们的分析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他们都表达了对最近电视发

生的变化的关注:对前卫(*avant-garde*) /现代主义者手段的吸收、对平面性(*flatness*)和对表面风格的重视、对传统叙事方法的屏弃、反映自我和表现自我(而不是作为自我和某种外部“现实”之间的中间物)的倾向。现在许多批评家都认为,这种后现代的美学要求我们用新的方式来“阅读”和理解电视。

显然,1980年代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而且也许是相关的)问题不是后现代批评家们提出的文本—读者关系问题,而是在大西洋两岸都因放权而发生巨大变化的文本—机构关系问题。1986年关于广播的皮科克报告(Peacock Report)向英国人认为的电视机构是一种公共服务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就英国电视而言,这就意味着对分析家们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提出了严峻挑战。当电视变得不再只是由两个垄断的国家电视台传送的文本,而是市场来源多样化的产品,也就意味着电视出品地的扩散——家庭录像带、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如今成了公共服务电视机构的补充。

为了讲清楚这些论辩,本书意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可以继续登堂入室(*working forward*),从而对1980年代的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基础。也就是说,本书认为,1970年代的理论著作并不应因其青睐经验性的、流行的和后现代的东西而被屏弃,只有在联系诸如意识形态、霸权和倾向,并通过理解电视如何调和性别、种族和阶级的社会关系,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对这些新东西的强调。

由于本书实质上是一本入门教材,我们侧重于通俗易懂而不是复杂精深,以使读者了解全貌,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今后自己的研究、阅读和分析达到更高的深度,因此,每一章尽可能全面、清楚地剖析一个论辩或者一种体裁,同时推荐3—4本主要的课后读物以及其他参考书。本书并不试图将各位作者所撰写

的章节统一成一个无懈可击的立场,因为有些章节本身就是以明显不同的研究方法为基础的;也无意暗示这些入门性的文章构成了理论上十分缜密的电视分析方法。这些文章叙述了机构和政策、观众研究和节目制作等多方面的历史。比如,帕迪·斯坎内尔对于公共服务广播的论述就与约翰·塔洛克对种族和英国广播的历史学分析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帕特里克·休斯就后广播技术(post-broadcasting technologies)提出了与理查德·佩特森讨论电视节目表时不同的角度和观点——尽管两人都可以很容易地与斯坎内尔为公共服务的辩护结合起来。安德鲁·古德温在论述电视新闻时提出了受众消费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在贾斯廷·刘易斯关于受众的讨论中得到了全面的发挥。

同样,对文本的不同研究方法也导致了时而互为补充、时而大相径庭的分析。古德温关于电视新闻的文章在一个基本上为社会学的内容分析所垄断的范例中提出了意识形态与电视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罗莎琳德·布伦特所著章节则意在介绍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其他文本分析技巧。这些思想又为本书的部分其他作者重新拾起,继续在由迈克尔·奥肖内西关于霸权的文章所引发的政治问题框架中进行辩论。保罗·克尔对戏剧—纪录片论辩的分析,威莉娜·格莱斯纳对肥皂剧的讨论,加里·惠内尔对体育节目和知识测验的分析,以及米克·鲍斯关于情景戏剧的文章,都各自论述了流行电视节目制作中不同方面的政治考虑。

在确定文章顺序时,我们没有按照历史分析、机构分析和文本分析作一个大的分类,因为很多作者更是拒绝这种划分。(例如,克尔和惠内尔有关电视机构和节目制作的内容可以说不相上下。)从抽象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没有考虑体裁这个问题,尽管对许多章节来说,从内容上都可以看出在努力理解那些影响我